

一个土匪的恩仇记

吴若平 著



一个土匪的恩仇记

吴若平 著



法律出版社

一个土匪的恩仇记

吴若萍 著

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07,000字

1986年11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40,000

书号：10004·019 定价：0.87元

内 容 提 要

《一个土匪的恩仇记》是一部主要以剿匪为背景、通过各种不同的人的命运、集中地反映了国家所走过的坎坷而又崎岖的道路的长篇小说。

从这部小说里，能够体验昨日历史之风云变化，洞察各种类型人物的风采和嘴脸：善良的农民为什么当了土匪？敢于仗义直言的干部又为什么成了犯人？两人在狱中又为什么建立起生死不渝的友谊？改嫁后的土匪老婆为什么当上了居委会主任？而革命干部又为什么变成了被管制的黑五类分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多年的被害者又为什么舍身救起了害他多年的仇人？一幕幕悲剧，一次次历史的教训，组合成这部作品的主旋律。

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小说，情节动人，故事曲折，感情真挚，文字简练，将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很好的教益。

三十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们连奉命进驻川南山区一个叫德胜场的么店子，配合武工队征粮剿匪。德胜场座落在山谷中间一块不大的、略微有些起伏的平坝子上。公路从坝子前面盘绕而过，蜿蜒地爬向西边山坡，背后山涧中冲出来的一条闪着银光的溪流，涓涓地流过坝子东边，跌落到深深的峡谷中，发出阵阵轰鸣。在一片低矮、东倒西歪的黑色瓦房中，有一条随着地势起伏、用石块铺成的街道，不知是山谷中经常浓雾弥漫，还是小镇人家每天从河坝挑水泼洒的缘故，街上石块路总是水湿水湿的；参差不齐的两边街房，都是木板门面，因年久失修，已破败不堪，有的店门脚部已经朽烂，有的随着房子倾斜而打了支撑；街上只有几家卖点针头线脑、火柴肥皂的杂货店，一家橱窗内挂了条仅够一只猫饱食一顿的腊肉饭馆，还有一家茶馆，内有十多张低矮的、污垢很厚的茶桌和几十把竹靠背椅。冷场天几乎甩棍子打不到人，只有赶场天，整个场子才慢慢醒了过来。太阳三竿高了，四面山上的羊肠小路上，背着背篋、提着竹篮的男女农民，陆续通过场两头闸门，汇集到狭小的街道上来。他们头上包着白布、黑布帕子，一色粗蓝布衣裳，穿得邋邋而褴褛，蜡黄的脸显得迟钝而呆滞。背篋里装的不是干胡豆，就是干辣椒，或是红苕，提篮里大多是鸡蛋什么的。为了多卖一分钱，他们常常从街这头走到街那头，太阳快要正中了，赶场的人达到高潮，整个场子象一锅开水翻滚着。这时，茶馆里座无虚席，人们喝着茶，吸着烟，说着各自的话，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叶子烟味道。待到太阳偏西，各自背

来的东西都脱了手，男的钻到饭馆买醉去了，女的上杂货店买些针头线脑和盐巴火柴什么的，然后又从两头闸门里吐了出来，沿着伸向四面八方的小路向家走去，不一会儿整个场子便又空了下来。

部队进场的第一天，天气热得闷人。队伍四人一排沿着公路来到场前，变成了一路纵队，走过一条与场子相连结的青石板小路，来到场西头庙前坝子上，便一眼看到胡乱躺在地上的七、八具被枪杀的土匪的尸体：脑壳被掀在一边，脑浆溅得满地、好些苍蝇在上面嗡嗡叫着，庙前照壁上还赫然写了七个大字：“看！当土匪的下场！”我心里止不住“咯噔”了一下。

身材高挑，在大檐军帽下有双炯炯发光眼睛的指导员皱了皱眉头。场四周几个制高点上分驻了两个排的兵力，另一排住在场两头闸门楼上，我随连部住在场正中一家门前有个猪肉案的屠户家。这是座两进两厢房子，只是后进中间一间有个小门，通向一座足有三层楼高的碉堡，站在碉堡最高一层，整个小镇便可尽收眼底，还可看到进驻四周制高点的战士，正在挥动洋镐铁锹赶筑工事，岗哨枪上的刺刀，在夕阳下闪着亮光。连部就设在碉堡内。

房东只有婆婆、媳妇、小孙女三人，挤在后进的一间没有窗户的黑房内。店门板好多天没有下过，结了不少蜘蛛网，青石板铺的天井里长满苔藓。右厢房是厨房，后进正中放了方桌和四条板凳，那是用来吃饭和接待客人的地方。

当指导员赵凯要我把房东喊出来见面时，头上包着白帕子的婆媳俩都惶恐，只有那个不懂事的、围了个红肚兜的小孙女不知畏惧地一会摸摸我的电筒、手枪，一会又走到指导员跟前好奇地看看垂在胸口上的望远镜，指导员顺手把她抱起来放在桌子上，摸着她头上扎着两个刷把似的小辫，向立在一边剪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媳妇问她叫什么名字。

“小红。”她垂着手，乌黑的眼睛胆怯地望着指导员。

“她爸爸呢？”指导员边逗着小红玩，边漫不经心地问。

“爸爸——”

“爸爸到山里杀猪去了。”面色蜡黄穿戴却很干净的婆婆慌忙补了一句。

“不常回来么？”我望着媳妇问。

“不常回来。”婆婆又代替她回答。

婆婆话刚落音，媳妇却垂下了头，以至洗得很干净的头发披下来，遮住了她半个圆脸。

“你们坐嘛！”指导员抽出条板凳递给她们说。

“老总们坐！”婆媳向后退了一步，却不敢落座。

“我们不叫老总，”指导员望着她，同时又望了望我，“叫同志。以后我们住在你家，就象是一家人。你们不用怕，如果我们有什么不对，你们随时给我们提出来。我们是来配合这里区上武工队征粮剿匪的，对老百姓一律保护。”

正说着，通讯员小马给指导员打来了洗脸水，指导员指着脸盆中的水说：“就是用你们家水缸里的凉水，我们都要负责挑还！”

“哪里哪里，”婆媳俩几乎同时说，“凉水也不要钱买，河坝里有的是。”

“不要钱买，”我接着说，“要力气挑呵，你们妇女挑担水可不容易。以后我们在你家水缸里用水，缸里的水就由我们包挑了。”

“那咋个要得呵！”显然她们感到很不过意，态度比刚见面时缓和一些了。

吃过晚饭，月亮刚从场后山垭口上爬上来，整个山谷都沉浸在朦胧的月色中，指导员便要我陪他一起去区委研究一下配合行动问题。区委设在场背后一里多远的一座建造得异常

坚固的地主庄园里。在区委，我们见到了区委书记丁心。这是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中年汉子。我们原想和他交换一下工作意见，不料刚一见面，指导员赵凯便跟他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辩。

“你们进场时看到了吧？每一场我们都要打一批！”丁心神情严肃地在房间踱着步，有些激动地说，“斗争非常残酷，土匪逮到我们下去征粮的人，都投到烧窑的烟筒里给活活烧死。不狠狠惩罚他们不行啊！”

“是不是罪大恶极才……”身材高挑带有河南口音的指导员，闪着有些困惑的眼光问。

“我认为凡是参加土匪暴动，敢于抵抗……就得让他尝尝人民的铁拳头。”丁心又停在指导员跟前用教训的口气说，“不如此，我们就镇压不了土匪的嚣张气焰，就要犯右的错误，我们党史上……”

这时候有个长满络腮胡子的武工队员进来跟丁心耳语了几句，他的话音刚落，丁心便向他吼道：

“吊起来！看是他骨头硬，还是……”待那个络腮胡子队员走了出去，丁心又转向我们，用教训的口气说：“政策大多是属于宣传方面的。实际是实际，比如政策上是严禁逼、供信，但根据我们的经验，对土匪审讯，如果没有点灵活性就别想……”

“这样做是否有弄错的，会伤害真正的群众？”很善于控制自己情绪的指导员赵凯，又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我的同志呀！在这么大的革命运动中，”区委书记丁心朝我们笑了笑，然后扬起他的右手向下一劈说，“在为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的事业中，要想不犯一点错误，那是不可能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土匪逮到我们的人，也不问青红皂白。我们就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指导员冷冷地望着丁心，显然被他那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和他对人的轻蔑态度激动得难以自抑，他霍地一下立了起来，眼睛闪着晶晶亮光，激动地说：“我们部队不能同意你这种极端方法。这样做是让土匪牵着鼻子走，看起来是非常什么的，实际上违反了党区别对待的政策，把群众全推到土匪那边去。”

争论越来越激烈，双方各执己见，终于不欢而散。

在回来的路上，指导员郑重地对我说：“在跟土匪的斗争中，要跟丁心这种极端政策划清界限，坚决按团党委指示办事，要相信群众中的大多数。”

回到连部，指导员向团部挂了电话，团党委完全同意指导员的看法。

几天后，由连长带着部队，给土匪以有力的打击后，便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除在沿街墙壁写了标语，在连部对门一间民房上，正式挂上“土匪自新登记处”的牌子，指导员还指派我住在自新处内，负责这一工作。

在一个闷热的月夜，我正斜靠在床头墙上，凑着挂在墙壁上的马灯，看着团部发下来的“剿匪战报”，忽然场外垭口处响起几声零星枪声，我忙丢下战报，正想去找连长，了解可能发生的情况。这时候，虚掩的房门“咣啷”一声被推开了，只见房东媳妇陈翠英立在门口，平时我们相处极好，她不断给我们送茶送水，特别在我胃病发了的时候，还到处给我找草药煨来吃，这时只见她那双闪耀在桃形脸上的眼睛，流露一种胆怯而又惊慌的神情，胸脯在急骤地起伏着。她刚立定，便有个值班战士，端着在月亮下泛着银光的枪刺，捧到门前狐疑地向她问道：

“才将是不是你从垭口那里跑了过来？”

“是的。”她紧张地说。

“你怎么深夜还去那里？”值班战士有些抱怨地说，“问你又不回话，差一点……”

“大月亮的，我以为你们看见我了。”她理亏地垂下了头。

在值班战士走了之后，我想她这种时候来找我肯定有什么急事，就关怀地问：

“有事吗？”

“黄干事，我想问问你……”她欲言又止地闪动着眼睛。

“你坐下来嘛！”我指着桌后一张方凳请她坐，“到底什么事呀？”

“哦，没什么，天热睡不着，顺便进来问问，你还要不要热水？”

最近我的胃病犯了，她每天都要送瓶开水来给我装热水袋捂胃部。

“不要了。”我感激地说，“前几天吃了你给我煨的中草药，胃就不那么痛了。你不是临晚已给我送了开水么？”我指了指桌上的水瓶说。

“啊！我忘了。”她搪塞着，转过身子，左手掙着桌子角怯生生地望着我。

“你有话就说嘛！”我一边用脚勾着床下鞋子，一边走下床来，说，“看来你有事找我说，但又不信任我！”

“不，不，我就是信得过你才来……”她抬起眼睛望着我，象是下了决心才说出口的，“我想问你一句话：自新过的土匪，日后真的不要紧吗？”

我以为她出自对某个亲友的关心，来找我摸底的。当地确有不少群众因受土匪歪曲宣传的影响，加上区武工队的极端做法，对我们党的政策有怀疑。我感到有责任向她解释清楚：“党的政策不是写在墙上吗？坦白……”

“慢点。咋个叫胁从不问？”她打断我的话，同时睁大了眼

睛，胆怯地看着我。

我反复地、详细地给她解释，直到她一再地点头，表示明白了，我才补问了这么一句：

“这一夜你来问这些干什么呢？老实告诉我，是谁叫你来的？”

“唉，小红她爸让米占武龟儿子，压迫着……”说着她一下跪到我跟前，哀求地说，“黄干事，你要救救他，救救我们一家啊！”

我心止不住地“咯噔”一下，原来她的丈夫也是土匪？怎么住在一个土匪家里还不知道啊！一个多月，她丈夫没回来竟没引起自己怀疑，没有引起自己的警觉，我是多么麻痹，工作又做得多么粗糙啊。

“起来，你过去不是说他在外面杀猪么？”我皱着眉头问。

“他是杀猪，但他是让那土匪龟儿子胁从着……”

“他现在在哪里？”

“就躲在垭口那边土坟里。”

“啊，就在……”我吃惊地重复了一句，心中暗暗喊道：多险哪，土匪潜伏到鼻子下面也不知道。但我仍沉住气问，“你能找到他么？”

“我刚才就从他那里来的。”她诚恳而坦白地说，“让哨兵发觉……”

“啊，刚才就是朝你打的枪？”

她点了点头。

正说着，指导员赵凯来了。陈翠英膝盖一软连忙又跪下了，指导员慌忙说：“哎哎，快起来！咱们解放军、共产党有政策的嘛。你不是听过黄干事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吗？不管是谁，坦白就从宽，抗拒就从严！”

“知道、知道。”陈翠英连连点头。接着又说：“我丈夫也

想自新呢！”

“那好嘛！”指导员一面说，一面朝我点头示意，“黄干事，陈翠英丈夫要自新，这个态度咱们要欢迎！”接着他又问陈翠英，“那你看什么时候找他来自新好呢？”

“我这就去。”

“可以。”指导员转身对我说，“送她出去。”

我开了门，陪她走了出去，一直送她到街头碉堡闸门口，跟碉堡上的卫兵打了招呼，望着她走到月光下，渐渐远去的背影，慢慢地溶入朦胧的月色中……

不一会，街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看样子是房东媳妇陪她丈夫自新来了。我忙穿上军装，戴上大檐帽，坐到桌前，扭亮马灯，从抽屉里取出《土匪自新登记簿》。刚做好这些，陈翠英便先一步跨进房来，随着是先前的那个值班战士。我很诧异，便向陈翠英问道：

“你丈夫怎么没跟你一块来？”

她望着我，无可奈何地说：

“他走都走到门口了，一眼看到门岗，又吓得转身跑回去了，我抓都没抓住！”

“为什么呢？”

“怕你们把他交给区上。”

“你明天再去跟他说。”我再一次加以说明，“我们部队是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的，是受部队党委直接领导的，刚才指导员不是已经向你说过了吗？只要他老实交待，我们部队就对他负责到底。你要他相信我们部队好了。”

于是，她决定明天一早再到山那边的土坟里去找他，指导员同意我跟通讯员小马，换上便衣，尾随在陈翠英身后，亲自向她丈夫做说服工作。第二天一早，我们翻过背后山的垭口，沿着长满荆棘葛藤的林间小路，向着阴凉的老林深处走去。

没走多远，领路的陈翠英忽然收住脚，躲到一株粗大的长了一身虫疤的橡树后面，双手张开，拦住我和通讯员小马说：

“瞧！”

我们顺着她手指看去，一个身材魁梧、壮实的青年汉子，正从一座空了的土坟中伸出个满是灰尘的脑袋，向四面张望了一番，才慢慢爬了出来。我们一下蹲在齐腰深的葛藤中，屏住呼吸，密切地注视着他的动向。只见他惶恐不安地向我们走来了，但走着走着，又心事忡忡地收住了脚，两颊、嘴唇也都凝紧着。接着又走了回去，没走几步，又站住了，顷刻，猛地一跺脚，象横下一条心似的，又走了回来，可是快走到我们躲着的橡树前，又收住脚。正当他举棋不定的时候，陈翠英从树后走了出来，叫了声：

“文龙！”

他吓了一跳，正要转身撒腿开跑，见是陈翠英叫他，才又稳住了神。

“你别再三心二意了。”陈翠英向他走去，鼓励他说，“驻军黄干事早看到你在这里……要逮你早逮住你了，只是他们想让你走一条坦白从宽的道路。黄干事要我跟你说……”

他们立在树下，谈了好一会，我跟小马才从荆棘、葛藤中立起身来，向他们走去，因为我们穿着便衣，纯粹是农民打扮，直到我们走到跟前，那个叫文龙的一时还闹不清我们是什么人。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住在我们家的黄干事。”陈翠英指着我向他说，“跟我一块来做你工作，还不跪下！”

随着“咕咚”一声，那个被陈翠英称呼为文龙的汉子象一截树桩似的跪在我的跟前，我仔细地看了看他，浑身全是灰尘，连身上那件粗蓝布褂子的布眼都给糊住了，对襟衣裳钮子差错地扣着，以至使他那发达的胸肌更加突出，看来除了在那

宽阔前额下面的那双眼睛是黑的，通身几乎没有一处是干净的。

“起来！”我厉声地说，努力表现出一个军人的威严。

待他惶恐地从地上立起身来，我接着问：

“叫什么名字？”

“庞文龙！”

“多大？”

“二十四”

“党的政策知道吗？”

“小红妈都跟我说了。”同时他看了看立在一边的陈翠英。

“既然如此，你还有什么彷徨犹豫的？如果你还不愿走自新道路，现在你还可以跑到山里去，但最多要不了两个月，你不是被击毙就要被捕获。两条道路你考虑……”

“我怕区上……”

“我们党的政策在哪里都一样，你只要老实交待了就会受到党的政策保护。”

“我愿走自新道路。”

回到住处的时候，我取出“自新登记簿”，立在旁边的陈翠英便不断启发他说：“有什么就说什么，要老实，我亲眼看到好多人，罪比你重，只要你坦白交待了，都没有事。黄干事人心好，只要……”

“不是我心好，”我纠正她说，“是党的政策好。”

“呵，对对，是党的政策……”她赶忙作了纠正，“只要老实交代，一切都会好的。”

庞文龙不知是第一次见到我军，有些胆怯，还是压根就不会讲话，厚厚的嘴唇仿佛不听他指挥，哆嗦了半天还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好不容易才听清他原是跟父亲学杀猪的，两个月前的一个深夜，他家闯入一伙一手持枪，一手擎着火把的米占

武匪帮。火焰在那些肮脏、汗渍和满脸胡茬的匪徒脸上，闪着忽明忽暗的光，那些人在他家翻箱倒柜地洗劫一空之后，便用乌黑坚硬的枪口抵着他的胸口胁迫他带上杀猪家什跟他们一块走，倘有半个不字，就开他的“天窗”，“放他的血”。他望着妻女，心象被牛角尖刀绞着那样难过，怎么也舍不得走开。他不断紧着腰上裤带，两只眼睛发射出仇恨的火花，陈翠英知道这是他横了心豁出来的表示。他过去跟人打恶架前就是这样紧着裤带。她怕因此而造成无法挽救的后果，就不断给他使眼色，又硬着心肠，推着他跟土匪一块走了。他在土匪中的任务，是把抢来的猪当场屠宰，以最快速度弄出一刀刀肉来，给土匪头头们带走。后来跟土匪厮混熟了，便放松对他的监视，在一次我军追击的路上，他佯装大便，待土匪远去了，才乘机跑掉，但又不肯直接回家，先钻进森林躲了一阵，后来才潜伏到后山的一个空下来的土坟里。

“你在后山土坟里潜伏了多少天？”我停下手中的笔望着他问。

他把满是灰尘的大脑袋歪向一边，布满红丝的眼睛凝视着墙壁，粗黑的眉毛紧皱着，显然是在回忆。

“有半个月了，”他扳着手指算着回答，“不，十三天半。”他又做了改正。

“从哪里弄吃的呢？”

他沉默地垂下了头，胆怯地瞟了瞟立在一边的陈翠英。

“我饿了。”陈翠英象做了错事的学生立在老师的跟前，害怕地歪着头，她那洗得干净的头发又滑了下来，遮住了她的脸。

“我饿极了。”记得几次晚饭后的傍晚，我一个人在闸门外那条石板道上散步，曾几次碰到她提一篮篮子到溪流的溪流里清洗，在我向她招呼时，她显得神

不守舍，这一切竟没有引起我的怀疑。现在经她一说，我又止不住地暗责自己麻痹，粗心。可是妻子给丈夫送饭是人之常情，也不好深责。只好象对一般自新后的土匪一样，向他严肃地宣布：要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每星期三、五下午要到街西头庙坝子上听时事训话，离场去外地，有事先请假，没有交待清楚的，可以继续交待。他似乎没有完全听懂我的话，多半是陈翠英代为翻译的。可是当我宣布他可以回家时，他却一下听懂了，脸上立即露出激动的喜悦，接连向我鞠了好几个大躬，才退了回去，大步地跨过水湿狭窄的街道，进家里去了。接着便从对门厨房天井里传来打水和挪动澡盆的声音……

二

第二天一早，便看到庞文龙已剃过头，换了衣服，拿着把大扫帚，从天井扫到街心，又从街心扫到后院，后门外面坝子上多日无人过问的马粪，让他扫成一堆堆的，连平时总是干涸的水缸，也让他刮了缸底，挑得满满的，整个家庭也因他回来充满了生气。房东婆婆那张苍白的面孔也有了红润，陈翠英活泼了许多，原先有些菜黄的面孔，没几天就浮上一种少妇自得的风韵。她更大方，更自然地跟我点头、说话、问好。有时我们出去剿匪，她便擅自把我和指导员、连长换下来的脏衣服拿去洗了，然后叠好，放到我们各自床上。在这期间庞文龙也配合着做了许多事情，见她煮饭缺少柴禾，便上山打柴或是把大块木头劈碎，又抱来摆在她面前；见她洗衣累得满头大汗，他便把毛巾拧好送给她揩脸，或是倒碗热茶凉着，让她润喉解渴。

正当他们合家为庞文龙新生感到无限喜悦的时候，一天，区委书记丁心带着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武工队员来到连部，不巧指导员和连长到各排防地检查工作去了。丁心便走进我的“自新登记处”，一屁股坐在房间内那张唯一的方凳上。只见他裤筒一直卷到腿膝，包着红绸的手枪的大机头张着嘴，似乎随时都有投入战斗的可能，他好象刚从哪里蹚水过来的，穿在脚上的草鞋是水湿水湿的，每走一步，无不在地上留下个水湿的脚印。他刚坐下，便从口袋里摸了盒小刀牌香烟，甩了根在我桌子上，接着便划燃了火柴，客气地要我先点，直到我说自己不会吸烟，他才用就要烧到手指的火柴点着自己嘴上的香烟，深深地吸了口，吐着烟雾，有些居高临下地问我多大了，什么时候参军的，读过些什么马列著作，接着便又用教训的口气说：

“你们年轻人，能够参加这最后一次跟土匪的斗争，这对你们今后各方面都有好处，只有亲身经历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战斗，才能真正知道什么叫阶级斗争，什么叫革命！这些天来有多少土匪来这里自新登记？”他又狠狠吸了口烟。

我打开“土匪自新登记簿”如实地向他汇报了具体数字。

“缴出了多少枪支，弹药？”他伏到条桌上，身体前倾着，仿佛要把我说出的每个字，都听到心里去。

“两支马枪，三支大盖，”我翻着登记簿说，“五枚手榴弹，二十七发子弹，还有……”

“什么？什么？一百四十多人自新，只缴收……”他瞪大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打断我的话不满地问，“退回多少赃物？”

我边翻着本子边说：

“陈二娃抢过三担谷子，退赔了两担胡豆，王小虎退回两床铺盖，一顶帐子……”

“好了，好了。”他又急躁地打断了我的汇报，气愤地说，